

#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

## 台灣認同的新發展及其效應

報告類別：精簡報告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MOST 109-2410-H-004-047-SSS

執行期間：109年08月01日至111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鄭夙芬

共同主持人：游清鑫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陳冠臻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曾筑翎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蘇浚祺

本研究具有政策應用參考價值：否 是，建議提供機關

(勾選「是」者，請列舉建議可提供施政參考之業務主管機關)

本研究具影響公共利益之重大發現：否 是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08 月 02 日

**中文摘要：**2019年1月初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談話的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以及3月開始的香港「反送中」運動，在台灣引起許多的反應，使得台灣民眾對於一國兩制更加疑慮，「反中」的情緒在社會漫延，台灣認同也更加深化；而蔡英文總統對中國採取強勢的回應，對香港爭民主運動也表示支持，讓她的滿意度大幅上升，且不被看好的連任之路，也在「抗中保台」的策略下，有反敗為勝的氣勢，尤其是得到非常多年輕世代的支持，連帶也使得向來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國民黨，在面對兩岸關係及選舉攻防時顯得左支右絀。這一連串的認同事件，固然也因為即將到來的2020年總統與立委大選而有所強化，但台灣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究竟是對事件的暫時反應，還是認同的走向的確有所改變？而台灣認同的新發展，是否會對於未來兩岸關係的走向、世代間的差異及政黨體系的發展造成影響，值得仔細探究。

**中文關鍵詞：**台灣認同、一國兩制、兩岸關係、世代差異、政黨體系

**英文摘要：**There have been widespread concerns among Taiwanese citizens since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policy address of January 2019, which indicated that Beijing's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unification would be the only viable option for Taiwan. Beijing's negative reaction to pro-democracy protests in Hong Kong furthered the island citizens' unease. Tapping into this anxiety, Taiwanese President Tsai Ing-wen of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issued a statement that firmly rejected Xi's overture. To many island citizens, Tsai's response "looked very presidential." Her approval ratings surged as a result, particularly amongs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hich gives her re-election bid a substantial boost. Tsai's opponent, Han Kuo-yu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was caught in a difficult position due to his proposed engagement approach toward China. With a rising anti-China sentiment, a Taiwan-centered identity has received substantial support on the island. The proposed research is aiming to examine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is the rising Taiwanese identity temporary? Or, does it represent a part of a permanent trajectory? In either case,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Taiwan's national identity on its domestic politics as well as future cross-Strait relations?

**英文關鍵詞：**Taiwan Identity, One country Two System, Cross-Strait Relation, Generational Difference, Party System

## 一． 前言

在臺灣特殊的政治歷史環境之下，造成臺灣民眾的認同呈現多元化的面貌，同時也展現階段性的變化。臺灣民眾目前固然逐漸有較高的比例較偏向具有臺灣文化獨特性與政治自主意識，然而在不同群體中也存在著差異，不同世代間也經歷不同的政治環境，使得認同的形成過程與效應也有所不同，因而讓臺灣民眾的認同面向，有一些共識但也仍存在分歧，交織成臺灣認同的獨特性與不穩定性。也正因為臺灣民眾的認同交織著原生性血緣的文化因素與建構性的政治因素，我們逐漸發展出一個測量臺灣認同的指標，此一「臺灣認同」指標用於探討 1996–2016 年的六次總統選舉中民眾的投票行為，發現台灣認同都扮演重要的角色（鄭夙芬 2009a、 2013；鄭夙芬、王德育及林珮婷 2018），另外也發現民眾的認同除了對其投票行為有所影響，也影響民眾對中國大陸的看法與態度及對兩岸關係的態度（Wang and Cheng 2017），也與民眾對政黨的支持有關（Wang and Cheng 2018）。中國因素也是形塑台灣認同及影響台灣認同走向的重要變數，2019 年的習近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香港的反送中爭民主運動，都給台灣帶來相當的衝擊，因此，本計畫的重點即在於探討 2019 年的相關認同事件，是否會使台灣認同產生變化，而認同的發展又將對台灣民眾的政治產生什麼效應。

## 二． 研究目的

2019 年從 1 月開始的習近平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及香港反送中爭民主運動以來，在台灣引起許多的反應，主要是使得台灣民眾更不能接受一國兩制，反中的情緒也在社會漫延，連帶使得向來主張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國民黨，在面對兩岸關係及選舉攻防時顯得左支右絀。這一連串的認同事件，固然也因為 2020 年的總統與立委大選而有所強化，但台灣民眾在認同上的變化，也充份顯示認同具有流動性的可能，然而這種變動究竟是對事件的暫時反應，還是對於認同的走向的確有所改變？但不論如何，台灣認同的目前的新發展，應該會對台灣社會產生衝擊，因此，本計畫的研究目的將探討下列的議題：

1. 認同的走向：認同議題是台灣社會的主要分歧，來自原生的文化認同與菁英建構的政治認同，同時在台灣社會交織與拉扯，則讓台灣民眾的認同仍然未能達到共識，台灣民眾並不否認台灣與中國在血緣文化上的連繫，但在政治認同上則認為中華民國和中國是兩個不同的國家，（鄭夙芬 2019）然而李冠成及楊婉瑩的研究指出：「隨著族群之間的交往和社會開放以及民主化的進程，該認同的實質意涵從過往的族群式認同逐漸轉變為政治性的認同。」（李冠成、楊婉瑩，2016: 139）申請人則從認同界線的觀點，認為台灣認同已進入以台灣（中華民國）做為和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立的國家認同階段。（鄭夙芬 2013、鄭夙芬、林珮婷、王德育 2018）因此，在 2019 年台灣民眾所產生的「亡國感」，正如團體威脅論的觀點，認為中國大陸對台灣在實質性（以商逼政）及象徵性（混亂社會秩序及侵蝕民主價值）的團體威脅強

化，也會進而影響台灣民眾認同的形成。(蒙自成 2016:237)，台灣民眾是否會因為中國對台灣的威脅感加重，在強化台灣認同的同時，發展出長遠的認同共識？

2. 認同的世代差異：申請人之前的研究顯示（林珮婷、鄭夙芬、王德育 forthcoming），最年輕的世代有著最強烈的台灣認同意識，然而此種認同意識，並未表現在他們的投票抉擇之上，在2016年的總統選舉中，最年輕的世代在2016年時，並沒有特別支持民進黨及蔡英文；申請人的另一個研究也發現（Wang and Cheng 2019）與其他世代相比，最年輕的世代在兩岸關係上抱持觀望態度，同時他們也表現出和中國大陸發展經濟交流的強烈希望；年輕世代對於九二共識的支持度是分裂的，雖然和其他世代相比，他們對於九二共識的支持度是最低的，但是他們之中也有同樣比例的人支持九二共識是一個可以維持兩岸和平的機制。然而經過2019年相關認同議題的發酵之後，年輕世代對於中國及較為傾中的國民黨的看法，有集體轉向較為負面的方向，而且從總統選舉的各家民調上，可以看出和其他世代相比，年輕世代最為支持蔡英文總統；<sup>1</sup>另外，此種「反中」的情緒，不完全只存在年輕世代之間，似乎也有往其他世代擴散的現象，是否代表台灣各世代間的認同差異在逐漸縮小之中？
3. 認同與兩岸關係：接觸理論強調不同群體間的接觸，可以促進社會聯結及正向的團體關係，但是Wang and Cheng( 2017)的研究指出雖然台灣與中國大陸頻繁的互動，但台灣民眾似乎對於中國大陸仍然有著相當的不信任與負面觀感；當台灣民眾愈來愈傾向台灣政治的主體性，對於一國兩制的反對愈來愈高，甚至對中國的反感昇高的情況下，不論2020年由哪一個政黨贏得總統選舉，都必須面對台灣民意的主流，然而台灣民意的走向，顯然又與中國大陸的立場相左，未來政府應如何在順應民的情況下處理兩岸事務，相當值得關注；另外，楊婉瑩及張雅雯的研究指出台灣民眾對大陸移民的態度明顯地受到政治認同的影響，「族群式台灣民族主義最為排斥大陸移民，公民式中國民族主義最接納大陸移民」(楊婉瑩、張雅雯，2016: 2 )而台灣社會中的反中情緒，是否會因為對中國的對抗，也發展出對大陸民眾的排斥，從而影響台灣與中國大陸的交流與溝通？
4. 認同與政黨體系：國民黨與民進黨在台灣認同的意識型態上，分別代表不同的立場，研究發現臺灣意識是穩定民進黨基本盤的重要因素，對於民眾的投票選擇也有重要的影響力（陳陸輝、耿曙與王德育 2009、鄭夙芬、王德育及林珮婷 2018），顯示政黨的發展在台灣，與民眾的認同間有關聯性存在。2019年所發生的諸多認同事件，讓2018年台灣最大黨是「討厭民進黨」，轉變為有將近七成的民眾「討厭共產黨」的情況，連帶也使得被認為立場較為親中的國民黨，受到許多的批評，政黨的支持率也持續下降。相對的，蔡英

---

<sup>1</sup> 新頭殼，<https://newtalk.tw/news/view/2019-06-13/259387> (檢索日期：2019年12月25日)

文總統在統獨立場上修改為維持現狀，在回應中國大陸時除了表示「不承認九二共識，不接受一國制」，也要中國當局「正視中華民國存在的事實」，讓國民黨對「民進黨不承認中華民國」的批評落空；而國民黨對「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的堅持，也在習近平宣布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後，讓許多台灣民眾開始無法相信有九二共識有一中各表的空間，香港一國兩制的失敗實例，更難以得到台灣民眾的支持。雖然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提出「國家安全、人民有錢」的口號，來對抗民進黨的「抗中保台」策略，但是仍然無法在選戰中挽回落後的民調。當代表傾向中國的國民黨似乎逐漸失去民眾的支持，而代表臺灣本土意識的民進黨政黨，相對地逐漸得到較多的支持，臺灣認同在政黨體系的發展會發生什麼作用？

### 三・文獻探討

#### 1. 國外「認同」相關研究文獻

##### 1)「民族認同」的爭論：「原生說」對「工具說」

關於族群與認同，Hutchinson 與 Smith 認為族群是：「一群具有特定名稱的人們，有著共同的祖先傳說、共享的歷史記憶、一種或多種的共同文化、原鄉的連結、以及成員間彼此的團結意識」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6-7)，在這個定義之中，族群成員對於族群的歸屬，除了客觀的條件（如血緣或共同文化）之外，也可能還有主觀的情感因素（如對光榮歷史的記憶或團結的意識），因此，族群是一種相對性的團體認同，除了確定了個人的歸屬，也可以用以區分「我—他」(self-other)的差異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4)。

Anderson 認為族群有相當程度是透過「想像」(imagination)，而使得一些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因為具有相同族群意識的人而產生連結，而認為彼此屬於同一個群體(Anderson 1991)。Fearon 則認為對族群的認同有二種意義，第一種意義純粹是一種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y)，即用以界定某種特定人群的標籤，以及用以區分其成員身份及其特徵的歸屬；第二種意義則是讓個人特別引以為榮的一種特徵，因而對於某個特定團體產生的歸屬感 (Fearon 1999:2)。至於認同意識的來源，目前主要存在有「原生論」(primordialism 或稱「本質論」essentialism)，與「工具論」(instrumentalism 或稱「建構論」constructivism) 之爭辯 (Smith 1986、1995; 龔維斌、良警宇譯 2002:33-58)。「原生論」強調認同「與地域、血緣、種族、宗教、語言及風俗的原生連結 (primordial ties)」，而「工具論」則將認同視為「不同利益與處境的團體之社會、政治及文化資源」，是菁英競爭資源及爭取大眾支持時所建構的重要象徵，以及在特定情況下，菁英用以極大化個人理性抉擇偏好的策略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8-9)。原生論強調的是我群與他群間原生特徵與文化上的差異(cultural distinctiveness)，建構論則強調認同的社會建構--由傳統及文化抽取元素，建構可以劃定族群疆界(ethnic boundary)的工具。然而不論認同是原生的或是建構的，「認同」可以被視為一種群體成員據以和其他

群體區分的「特徵」或「意識」。對於認同形成過程的探索，可以讓研究者理解民眾是從什麼因素來看待和自己不同的「他群」，也有助於釐清不同臺灣認同意識者與政黨形象之間的關係。

## 2) 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聯的幾種解釋途徑

對國家的認同或是歸屬(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 attachment)，以及對自己所屬族群的認同或是歸屬(ethnic identity/ethnic attachment)之間，是一致的還是有衝突的？這個問題，在任何多元族群的社會中，是特別重要的。Sidanius 等人(1993)整理學界對於此一問題所提出的至少三種解釋。第一種為熔爐的觀點(melting pot perspective)，強調個人不重視自己原屬的群群團體而融入自身目前所處的國家中。如果此一觀點成立，各族群團體在國家認同上應無差異，且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應該不具關聯性。第二種觀點是族群的多元主義(ethnic pluralism)，該論點認為，各族群團體仍然維持其區別性，不過，族群間認為彼此是社會的平等伙伴，而個人可以同時對所屬族群團體以及國家抱持正面的認同。(de la Garza, Falcon, and Garcia 1996)至於第三種團體支配(group dominance)途徑(Sidanius 1993)則認為在多元族群的社會經常是一個族群支配其他族群，支配的族群認為他對於國家的資源以及符號具備有所有權。因此，該途徑隱含一個以團體為基礎而以階層式建構的社會。對於支配團體來說，其國家認同遠高於被支配的團體。Sidanius 等人(1997)運用針對以色列境內的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以及美國境內針對白人(即歐洲裔)、非洲裔、拉丁裔以及亞洲裔民眾進行跨國以及跨族群的比較研究，雖然結論對於上述三個解釋都可以找出部分的支持，不過，團體支配的解釋似乎更勝一籌。

Sidanius 的團體支配理論是以團體為基礎，強調一個政治體系中階層高的團體對較低團體的壓迫與支配。因此，從早期國民黨政府來臺後，對於本省籍民眾所採取的壓迫與不平對待，或是從少數外省人掌握絕大多數政治資源的角度切入，社會支配理論對於臺灣戒嚴時期的政治情況有其解釋性。從團體支配的觀點，看民眾的認同如何從過去的被壓抑、逐步開展、到首次政黨輪替後開花結果，我們相信民眾認同的轉變，與不同族群在政治權力結構中是否居於支配位置，有重要關聯。

## 3) 文化創傷理論

Alexander 在為「文化創傷與集體認同」(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一書形塑理論架構時指出：「文化創傷發生於當一個團體的成員因為一個可怕的事件，而在集體意識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永遠烙印在他們的記憶中，從根本且徹底地改變了他們未來的認同。」(Alexander 2004:1)而且從他的觀點而言，文化的創傷不是因為事件本身，而是其所帶來震驚及恐懼，成為社會的一種集體記憶，即使是没有實際經歷此一可怕事件的社會成員，也可能透過傳承或想像，而與身歷其境者產生同樣的創傷效應。

Alexander 也進一步指出，啟蒙性的(enlightenment and psychoanalytic)想法是將創傷視為是一種個人或社會對劇變的理性反應，個人或社會明確認知

引發創傷的主體或事件，對創傷的反應是為了問題的解決與改進，即由對過去的記憶指引對未來的想法，所發展的行動計畫是為了重新建構個人及集體的環境，以平息創傷的感覺。心理分析者認為造成創傷的殘酷事件會因為恐懼的情緒，啟動心理保護的機制，而使記憶到扭曲，只有重現造成創傷事件的殘酷客觀事實並脫離扭曲的記憶，心理才能得到平靜，創傷才能被消除 (Alexander 2004:3-5)。因此，應積極地將創傷視是一種社會治療的過程，因為唯有將創傷平復，才能讓社會得到安寧。

就台灣的情況而言，「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對台灣社會絕對是一個重大的創傷，雖然對於年輕世代而言，似乎是已是過去的歷史，但對於年長甚或壯年民眾，可能仍是一段深刻的記憶，即使在臺灣已進入民主社會後，社會的創傷似乎尚未被完全弭平，創傷的集體記憶是否仍在不同世代間作用，從而影響民眾的認同以及對於政黨的印象與看法，仍值得觀察。

#### 4)政治世代

由於人們在態度形成期所經歷的重要事件在後續的人生階段持續地產生影響 (Miller and Sears 1986；Schuman and Scott 1989；Jennings 1996；Broek 1999；Finkel, Humphries and Opp 2001；Mishler and Rose 2005)，出生於不同時代背景的人們，因其在態度形成期時的重大經驗差異，導致了他們在政治態度上的明顯差異，而形成了政治世代 (Mannheim 1972:119；Jennings 1987:368)，亦即，一個世代是由一群在態度形成期受到同樣關鍵事件影響的人們所組成，隨著時間演進，不同的關鍵事件發生影響了不同政治世代的形成，Eyerman and Turner(1998)也指出集體記憶是同一世代共享的文化與習性的基礎。一般而言，多數研究者所指涉的態度形成期是在青春期後期至青年期前期這段時間，(Mannheim 1972:115；Inglehart 1981:881；Sears and Brown 2013) 也約莫就是十六、七歲直到二十五歲左右這段期間。

同一個政治世代的成員應有著接近的年齡，因為年齡相仿者較可能在其態度形成期有相同的經驗。然而，我們應注意的是年齡上有所差距的人們不必然就屬於不同政治世代，因為政治世代並不是憑空形成，而是必須在特定的政治社會情境下形成。在一個長期穩定的社會中，出生於不同時間點的人們有著相同的政治經驗，彼此間在政治態度上沒有差異，這樣的狀況無法產生政治世代間的區隔。因此，社會變動的速度是影響政治世代形成的關鍵因素 (Mannheim 1972: 124-128)。政治世代此一概念對於我們檢視一個社會的政治變遷有相當大的助益：一方面，不同政治世代的顯現與世代間的差異乃是由劇烈的政治與社會變遷所造成；另一方面，政治世代此一概念可以協助我們解釋與了解諸多政治現象，這也正是研究臺灣認同及政黨形象的世代差異的重要性，臺灣認同的世代差異是在臺灣特殊的政治歷史下形成的，而政治世代間的認同差異，有可能是造成民眾對各個政黨的印象有所不同的因素之一，也是解釋影響臺灣未來政治發展的重要變數。

### 5)認同的測量與分析架構

Rawi Abdelal 等人於 2009 年出版的「測量認同」(Measuring Identity)一書中指出，認同的定義在於集體認同是一種社會類型，因內容 (content) 及爭論 (contestation) 二個面向而有所不同，「內容」指的是集體認同的意義，包含四種不互斥的類型：1.建構的標準(Constitutive Norms)：指的是正式或非正式界定群體內成員身份的規則，這些標準藉由建立對團體的期待及個人的責任而界定其社會意義；2.社會目的(Social Purpose)：指的是團體成員共同的目標，從界定團體的目的有助於定義團體的利益、目標或偏好；3. 關係的比較 (Relational Comparisons)：藉由「排除法」(what is not)來定義一個認同團體，也就是如何看待其他認同團體的方式，即「從與他人的關係理解自己(the understanding of self in relationship to others)」；4.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指的是人們如何看世界的方式、解曉及辨識自己的方式、對於自身問題及困境的理解、確認自己的利益及定位自己的行為，亦即由對異同的認識，來辨識、認同及分類其他人的方式，以及理解他們的行動的方式 (Abdelal et al. 2009, 19-27)。這些認同的「內容」也是群體內一系列爭論 (contestation)的結果，亦即在一個群體中，對於建構認同內容過程中會產生共識或歧見，而集體認同在「爭論」的概念中，不是固定不變的，會因為對認同意義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而改變。許多認同的對話，透過團體成員內部的爭論，而達成某種集體認同的意義，因此必須將「爭論」視為一種「團體內的過程」來研究。在 Abdelal 等人的分析架構中，內容的四種類型，可以包含集體認同的多種意義，而對內容的爭論，則說明了認同的流動性與取決於情境的本質，甚至每一種社會認同都包含了內容的所有類型，而在這些內容類型之內，有大小不同程度的爭論，所以社會認同因對規範、界線、世界觀、分析論及意涵的同意或不同意程度而有所不同。這樣的結構與概念化有助於說明學者們對社會認同之差異的測量，同時也有於釐清不同認同類型之間的差異，以及認同的因果關係，也有助於理解認同與行為之間的關係。

(Abdelal et al. 2009: 27-32)

關於政治團體的社會認同之概念化與測量，本書的作者們認為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測量及理解認同，如民族誌、調查、內容分析及言說分析等，也認為必須結合這些研究方法，才能完全去理解族群意識在大眾或精英層次的政治角色，只單獨使用某一種方法，並不足夠去理解一社會中族群認同的發展、演化及效應。本書從古典的族群與認同理論出發，提供了一個綜合性且相當清晰的認同分析架構，同時也建議可以使用的各種研究方法，對於在區分認同內容的概念運作化及研究的執行方法有相當大的啟發。

## 2.國內「認同」相關研究

### 1) 臺灣的族群分類

國內在認同方面的相關研究，學者們基本上也是依循上述西方之理論及研究，來討論此一問題。最早深度研究此一問題者，首推張茂桂、吳乃德及王

甫昌等人，在 1993 年出版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一書中，張茂桂、吳乃德及王甫昌都分別談到了臺灣族群認同的起源（張茂桂等 1993），大致上都不脫離以「省籍」做為區分的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分類，或是「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等四大族群的分類。（吳乃德 1993a；王甫昌 1993、2003；張茂桂 1993）王甫昌在 2003 年出版的「當代臺灣社會的族群想像」一書中，也將臺灣過去十年來有關臺灣族群分類的源起做了有系統的討論及總結，他認為：臺灣四大族群的分類中，還包括了「原漢（原住民/漢人）之分」、「省籍（本省人/外省人）之分」、及「閩客（閩南人/客家人）之分」三等種族群相對性，個人在此一架構之中都具有的「多重身分」，例如客家人（「閩南人/客家人」之分），也同時具有漢人（「原住民/漢人」之分）及本省人（「本省人/外省人」之分）的身份。（王甫昌 2003:57）

不過如此的分類方式，從族群認同（甚至一切認同）的關鍵在於「區別」(distinction) (Bourdieu 1984)的角度來看，唯有界定「他者」，方能彰顯「自我」；唯有意識出「他群」(they group)，方能建構出「我群」(we group)，他我兩者間的「族群疆界」(ethnic boundary)，就此而言，族群理論中「原生觀」(客觀基礎) 與「建構論」(主觀建構)的辯論，其實並非真正的焦點，因為「疆界」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原生」的，又總不免是「建構」的，雖然臺灣這四大族群的分類之中，的確包含了「原漢」的不同來源差異，但原生論卻不足以解釋除了原住民之外，其他三大族群的區別，因為無論閩南人、客家人或外省人，都來自「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的「漢人」；而且原生論的觀點也無法解釋臺灣四大族群或本省人/外省人之間的「我群」與「他群」對立意識從何而來。因而對「族群意識」或「族群歸屬」的釐清，其關鍵應該在於「區別」的手段。換言之，究竟根據何種「標準」方能引發跨越歷史、超越個體「血緣聯繫」般的認同感，形成「想像的社群」？或是族群意識與族群歸屬的建構，僅為政治操作之用，目的在選舉期間極大化選票？這是需要釐清與思考的。

## 2)台灣認同的發展

由於臺灣的民主化運動與族群運動的結合，使得族群與政治發展產生密切的關係，同時也隨著政治進入民主化的過程，臺灣的族群關係也有不同的階段轉變。吳乃德認為臺灣的族群關係有二個階段，一個是威權時代的「佔人口少數的外省人對政治力的壟斷、對本省人的政治宰制、對本土文化的壓制，以及因而引起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和緊張」；第二階段是民主化後，「臺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已不再是權力的分配和使用上的衝突，而是象徵層次『認同』的衝突」（吳乃德 2002:76）王甫昌也指出，在民主化後，臺灣的族群政治「主要表現在不同時間出現的民族主義運動所動員的『國家認同』之上。」（王甫昌 1998:224）換言之，在 1970 年代開始的本土性民主化運動，主要是以本省人的弱勢（悲情）族群意識，對抗外省人強調中國法統的威權統治。但在 1980 年代後期，尤其是民進黨成立之後，許多學者都認為，由

於民進黨對於族群意識的論述，使得臺灣的族群關係，開始轉變成以認同層次上的「臺灣民族主義」（臺灣意識）與「中國民族主義」（中國意識）相對立的階段。（王甫昌 2003；吳乃德 2002；徐火炎 1996；張茂桂 1993；鄭夙芬 2009a）王甫昌（2005、2008）也指出，在1992年戶籍法修訂時，取消了本籍登記，籍貫因此在戶口普查中消失，因為此一機緣，讓「以『中國』為範圍的『省籍』分類轉變到以『臺灣』為範圍的『族群』分類」。（王甫昌 2005:59）在臺灣認同發展的第一及第二階段中，我群與他群的界限，僅是以臺灣為中心的地理範圍內各族群間之意識差異，但臺灣在1987年與中國大陸恢復交流之後，因為中國因素的介入，使得臺灣認同的發展進入第三階段，認同的界限轉變成以「臺灣」（我群／我國），與「中國」（他群／他國）對立。蒙自成的研究也指出，台灣民眾的認同，已然成為強調國族認同的建構是以自由民主的公民意識為基底的「自由國族主義（liberal / civic nationalism）」，而非以原生血緣為建構核心的「族群國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蒙自成 2016: 207），李冠成及楊婉瑩的研究也認為台灣人認同構成內涵已從族群／原生性認同轉變為公民／政治性認同。（李冠成、楊婉瑩，2016: 168）因此，臺灣認同由原本在臺灣內部民眾之間的族群認同問題，轉變為「臺灣/中華民國」與「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國家」認同問題，讓臺灣認同的發展進入「國家認同」的層次，換言之，認同因素如何影響民眾對臺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的看法，是牽動臺灣政治發展的重要關鍵。（鄭夙芬 2013、2019）

### 3) 族群認同與政黨支持

族群認同與政黨間的關係，也是研究臺灣認同問題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由於臺灣的族群運動，在過去幾十年來，幾乎是與臺灣的政治民主化同時發展的結果，連帶的也使得族群的認同，也出現與政黨發展互相結合的情況。由1970年代代表本省政治弱勢族群的「黨外」，與代表外省人政治優勢的國民黨的對抗過程中，黨外通常訴諸本省人弱勢族群的悲情，以爭取民眾的支持；而在民進黨正式成立之後，民進黨代表本省人、國民黨代表外省人的情況，已隱然成形；不過族群成為區分政黨的社會基礎，應是在1993年國民黨內的外省勢力出走，成立「新黨」，以及2000年被視為國民黨內之外省勢力二度出走的親民黨成立後，又更為清晰。許多研究都指出，族群與政黨支持有顯著的相關（王甫昌 1994、1998；吳乃德 1993a、1993b；沈筱綺 1995；耿曙、陳陸輝 2003a；陳陸輝 2000；陳義彥和盛杏溪 2003）。不過近年來的研究也指出，臺灣認同在臺灣過去六次（1996~2016）的總統選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省籍則不再是民眾投票時的主要考量。（包正豪 2009；張佑宗 2006；鄭夙芬 2009a、2013）尤其臺灣近年來面對大陸的武力威脅以及經濟吸引，不同的政黨間也有不同的兩岸政策立場，民眾認同的轉變，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政黨的認知及支持，以及如何影響民眾的投票行為及未來的政黨政治發展，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主題。而政權的輪替，也代表政黨體系的

變化，因此，認同因素對於政黨勢力消長的影響，也值得觀察。

#### 4)臺灣認同與總統選舉投票行為

當臺灣認同進入第三階段的「國家認同」階段之後，認同在決定國家未來走向領袖的總統選舉中，更成為無法避免的議題。研究也證實認同因素在台灣總統選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徐火炎（1998）確認選民的李登輝情結心理，對於三屆立委與1996年總統選舉的黨派投票抉擇，都具有顯著影響作用。蔡佳泓等人則發現2004年總統選舉中，認同因素轉化為公投議題，是否領取公投票對台灣民眾的投票行為有所影響（蔡佳泓、徐永明與黃琇庭2007）。陳陸輝等人也同樣發現台灣意識是穩定民進黨基本盤的重要因素，對於民眾的投票選擇也有重要的影響力（陳陸輝、耿曙與王德育2009）。關弘昌（2009）則指出在2008年選舉中，經濟大環境的逐漸惡化雖然讓民眾對於兩岸經貿交流態度漸趨開放，但國家認同仍然有顯著的影響，支持獨立的民眾比較上仍然較不認同兩岸經貿交流可以讓個人經濟情況變好。鄭夙芬以台灣認同指標來探討認同在歷次臺灣總統選舉中的作用，則發現政黨認同是對投票抉擇最具解釋力的影響因素，但也發現台灣認同指標仍是解釋選民投票抉擇的一個有效變數，顯示認同因素在總統選舉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鄭夙芬2009a、2013；鄭夙芬、王德育、林珮婷2018）而誠如前述，2019年諸多的認同事件，也在總統選舉中發酵，究竟認同會如何影響民眾的投票抉擇，也將個重要議題。

#### 5)臺灣認同與兩岸關係

自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市場，臺灣雖然和中國大陸屬於「政治疏離、經濟融合」的情況（吳玉山1997），近年來大陸政府藉由經濟開放，以商圍政，不再用言語或是軍事行動恫嚇臺灣社會，但實際上是改採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強硬堅持「反國家分裂法」，在反對臺灣獨立的立場上完全不予退讓，也在國際社會上圍堵臺灣的空間；但另一方面，則是有計畫的、大規模地直接施惠臺灣民眾，試圖影響臺灣民意走向，並左右臺灣的大陸政策。不過吳乃德（2005:5）曾指出「理性的『物質利益考慮』和『感情的歸屬』，是解釋認同本質的兩個對立理論」，臺灣民眾面對中國政治威脅及經濟利誘的情況，他的研究結果發現：「族群文化認同的鞏固力量，大於物質經濟利益考慮的轉變力量」（吳乃德2005:30）但他也認為臺灣民眾的認同態度並不穩定（吳乃德2005:33），雖然在他研究的時間點上，「感情認同吸引力似乎大於物質利益的拉力」，（吳乃德2005:5-6）但未來仍有變化的可能。根據後續的研究顯示，臺灣民眾的感性認同堅持，仍然高於理性的利益考量（黃冠博2007；陳陸輝、耿曙、王德育2009；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甚至發現「看似左右民眾理性抉擇的『自評利益』，實際上卻為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所形塑」（陳陸輝、耿曙、涂萍蘭、黃冠博2009:88）。也因此大陸近年來對臺灣所採取的「惠臺」策略，仍然無法轉化臺灣民眾的立場（耿曙2009）。就2008、2012及2016年的總統選舉結

果來看，民進黨的選票結構與基礎，仍然以堅持臺灣認同意識的民眾為主，應該與民進黨在強調臺灣本土意識及認同的同時，仍無法提出兼顧民眾希求安定的心理與促進臺灣經貿發展的政策與願景有關（鄭夙芬 2009a、2013；鄭夙芬、王德育、林珮婷 2018）。理性的利益考量以及感性的認同二者之間的拉扯，不僅顯現在對兩岸關係及統獨立場的態度上，也可能影響對不同政黨的立場與政策的支持。不過在民進黨 2016 年重新執政之後，中國大陸對台灣又走回文攻武嚇的路線，在外交上也持續打壓臺灣國際空間；2019 年又進一步提出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也打壓香港爭民主的需求，這些措施已造成臺灣民眾更傾向臺灣主體性，理性利益在國家安全的考量下，似乎被暫時擱置，挑起的反中的情緒，應該會對兩岸關係產生一些影響。

#### 四・研究方法

本計畫想要觀察的重點是 2019 年因諸多認同事件所產生的認同新發展，會對台灣社會造成什麼效應，觀察及探究的重點在於集體認同的共識是否產生，以及若集體認同有所改變，世代差異、兩岸關係及政黨體系將會有什麼變化，尤其台灣認同隨著時代及環境的改變，都還在變化之中，需要研究者長期的投入與資料的累積。本計畫希望觀察及分析這些與台灣政治發展相關的重要主題，將結合質性以及量化的研究，以混合性研究方法(mixed method)的研究設計，觀察認同及政治態度的變化，對臺灣未來政治及兩岸關係發展的影響，作系統性的分析與觀察，因此，本研究兼顧理論意涵的探索，以及實際應用的可能性，未來也可將相關的研究結果，分享供國內外學界使用。本計畫執行期間 2020 總統選舉結果已揭曉，不論是蔡英文總統連任，或是政黨再次輪替，在認同研究上都有不同的意義，尤其在經過 2019 年的強烈認同動員之後，究竟是代表親中或本土勢力獲勝，都可以探究民眾認同的發展方向，我們先以焦點團體訪談方式，深入理解民眾的認同，以及對中國的印象、兩岸關係的看法與對政黨的支持因素，做為理解民眾認同內容及走向的基礎，然後再進行電話訪問觀察民眾的認同內容及對中國印象、兩岸關係的看法及政黨支持的立場。

#### 五・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在質性研究部份，共進行三場焦點訪談，部份分析結果已放入《台灣人／中國人認同：2000-2021》一文，文章已初步審查通過，修改後將刊登於《選舉研究》期刊。本計畫也進行一次的電話訪問，即將使用此一資料於 2022 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Annual Meeting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 Conference Group of Taiwan Studies 發表 "Cooperative and Conflictual Policy Positions: China Threats and Taiwan Citizens' Support for the 1992 Consensus" 一文。

# 10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鄭夙芬		計畫編號：109-2410-H-004-047-SSS			
計畫名稱：台灣認同的新發展及其效應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質化 (說明：各成果項目請附佐證資料或細項說明，如期刊名稱、年份、卷期、起訖頁數、證號...等)	
國內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1	篇	鄭夙芬, 解析台灣人/中國人認同:2000-2021. 選舉研究(已接受, 尚未刊登)
		研討會論文	0		
		專書	0	本	
		專書論文	0	章	
		技術報告	0	篇	
		其他	0	篇	
國外	學術性論文	期刊論文	0	篇	
		研討會論文	1		即將於2022年美國政治學會年會發表 "Cooperative and Conflictual Policy Positions: China Threats and Taiwan Citizens' Support for the 1992 Consensus. (proposal 已被接受)
		專書	0		
		專書論文	0		
		技術報告	0		
		其他	0		
參與計畫人力	本國籍	大專生	0	人次	
		碩士生	2		陳冠臻, 曾筑翎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非本國籍	大專生	0		
		碩士生	1		蘇浚淇
		博士生	0		
		博士級研究人員	0		
		專任人員	0		
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					